

情况下,大学基本上都是按照惯例运行,绝大多数的事务处理都是由现行的程序和非正式的认知或价值观来引导。尽管这种类型组织缺乏明确的目标,但是仍然能够出台相关的组织决策。之所以能够遏制破坏性冲突,主要是因为高校的权力集中体现在特殊问题的处理上,而团体成员则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问题并确立各自的势力范围。整体上来说,政党组织系统并不具备什么责任感,政党组织联盟往往会无视保护弱者的权益。

(四) 无政府组织模式

这种模式重视学术团体成员自主探索的权力,主要适合于学术性强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特点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表现在目标的模糊性、技术的不明确性和参与人员的流动性。^[6]在这种模式中,大学是由结构、职责和规章制度等要素构成的组织,标准化的程序确定了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途径,许多决策皆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做出的。而且,这种大学拥有独特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奉行以教师的专业化与学术权力为基础的精英教育标准,制约着参与成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在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无政府组织程式就会盛行起来;当学校资源减少时,无政府组织程式的重要性就会降低。资源分配与计划实施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里既没有明显的偏袒,也没有对某些目标的过分强调。系统的决策皆是系统自身所做出,而不受任何人的操纵与控制。

尽管这几种模式是大学运行模式的主要类型,但它们并非单独出现于特定的高校。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某些大学组织表面仅呈现一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它组织模式的特征,只不过所表现的强弱程度不同而已。譬如,组织成员要遵循合法的规章制度,认可上级科层组织指示的权威性,因此具有官僚组织特点;院系办公室、委员会、系科等小团体成员拥有相同的背景和利益,彼此平等对待,尽量采取大家都满意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具有学会组织特性;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正式或非正式团体进行影响学校资源配置的政党活动,于是形成政党组织模式;学院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而许多方面又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秩序和稳定,从而体现了有组织无政府状态。在综合多种模式的基础上,伯恩鲍姆提出大学控制或治理模式。他强调,大学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体现不同团体的愿望。所谓大学控制,即大学所参与人员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以及广泛沟通的过程。“官僚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目标是理性,学会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是意见一致,政党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是和平,象征性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是感觉,而控制组织管理人员追求的目标是平衡。”^[7]

三、大学控制系统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伯恩鲍姆将组织理论和控制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管理中,并构建了大学控制模式理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而且在实践上也引起了一场大学管理模式的变革。大学控制组织模式充分考虑了学术组织自身的基本特性,从开放式系统的角度全面地考虑到现代大学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促进现代大学管理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大学控制组织模式的反馈圈符合学术组织目标不确定的特性,重视各学院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学院系统的功能通过纵向的反馈圈得以控制,并通过学校的结构和学校系统的横向反馈圈得以强化。因党派性和象征性过程,反馈圈之间的关系或是松散联合的,或是牢固联合的。这些或松散或牢固的联合方式在学校系统的内部发挥作用,决定着学校组织文化的特征。学院的活动主要通过两种控制系统进行调节:第一种是结构控制系统,由可见的控制要素所组成,具体表现为组织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形式;第二种是社会控制系统,包括不可见的控制要素——团体成员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与团体的凝聚力。在两种控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学院的组织文化提供了促进认知组织目的和了解、选择与解释相关数据信息的环境。结构控制和社会控制模式都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反应敏感的反馈圈,其作用在于在必要的组织运行过程中进行一些稍微的调整,保证组织运行在可接受的限度内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可接受限度的微调不能成功控制组织运行状况时,组织要素自己就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改变组织的运行过程——这种负反馈圈调节维持组织的稳定性。

其次,控制组织模式的自动调节功能遵循学术人员所追求的学术自主性原则。面对复杂的组织环境,学院被划分为众多不同的规模较小、相对稳定的子系统,并通过科层结构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如此,复杂的组织问题被分割开来,每个具体问题的处理都由特定的决策者所负责。通过决策者人数的